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9771027

创新的空间

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

INNOVATIVE SPACES:
ENTERPRISE CLUSTER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王缉慈 等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9771027

创 新 的 空 间

——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

INNOVATIVE SPACES:
ENTERPRISE CLUSTER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王缉慈 等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王缉慈等著.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6

ISBN 7-301-04994-3

I. 创… II. 王… III. 企业经济-聚集经济-研究 IV. F27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1782 号

书 名：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

著作责任者：王缉慈 等著

责任编辑：符 丹

标准书号：ISBN 7-301-04994-3/F·419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 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www.pup.com.cn 电子信箱：zpup@pup.pku.edu.cn

电 话：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室 62752027

印 刷 者：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开本 13.125 印张 350 千字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4.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作者简介

王缉慈,女,汉族,1946年2月生,广西博白县人,1968年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毕业。现任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教授。兼任清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兼职教授、国际地理联合会经济空间动态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代表性著作有《现代工业地理学》(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新的产业空间: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与布局》(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等。发表中英文论文90余篇,主要有“The changing industrial geography of the Chinese Special Economic Zones”(*Economic Geography*, 64(4), 1986), “An analysis of new-tech agglomeration in Beijing: A new industrial district in the making?”(*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0, 1998)等。

内 容 简 介

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背景下,快速发展的区域出现新的企业集群特征,引起了地理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研究者的广泛兴趣,由于它对技术创新和知识创新具有重要意义,也受到了各国各地区公共政策制定者的越来越多的关注。

本书从跨学科的角度综述了企业集群的相关理论,着重评介了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新产业区理论,并结合我国当前区域发展和区域研究的现实,比较分析了国内外典型案例。结论指出,培养具有地方特色的企业集群,营造区域创新环境,以强化区域竞争优势,是增强国力的关键。

本书对于经济地理学和公共政策相关学科的专业研究人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书内容深入浅出,图文并茂,结合大量实例分析,也适合企业管理者、政府领导者和其他一般读者阅读。

序

本书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学部资助项目“新产业区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应用研究”(49771027)的研究成果,该研究始于1998年1月,历时三年。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学部主任的应急课题之六“我国乡镇企业集群的竞争力研究”也于2000年8月开始进行(项目号70041028),将于2001年5月结题,本成果也同时作为该课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课题组由我和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童昕、盖文启、朱华晟和魏守华等四个博士生以及刘春舜、张辉等两个硕士生组成。大家参阅了大量的中英文文献,进行了多次学术讨论,并设计了调查问卷,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信息技术产业的企业集群)、河北省清河县(羊绒企业集群)、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长安镇和石碣镇(电脑及其周边设备制造企业集群)、浙江诸暨市大唐镇(袜业企业集群)等进行了深入访谈,并走访了浙江温州柳市镇的低压电器企业、苏州昆山市的台湾电脑厂商、北京朝阳区的网络公司、广东惠州市的电子公司等,获得了很多第一手资料。北方交通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刘军国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周文博士也热情地参加了讨论和研究,并作出了贡献。此外,北大城环系的本科毕业生王可、吕昕、袁云、戈岳、周建宇、陈磊等同学结合毕业论文也做了很多工作,本科生覃宁宁、肖渝、蔡连春等人整理或翻译了个别文献供参考,他们的成果在本书中都有或多或少的反映。

本书按章次顺序的撰写人是:前言:王缉慈;第一章:童昕,王缉

慈;第二章:朱华晟,王缉慈;第三章:王缉慈,童昕,刘军国,周文;第四章:王缉慈;第五章:王缉慈,盖文启;第六章:王缉慈,盖文启,童昕,戈岳;第七章:王缉慈,朱华晟,盖文启,刘军国,袁云,张辉,魏守华;第八章:王缉慈,童昕,王可,刘军国。文中的插图分别是由各章节的撰稿人完成的。我对全书作了构思、统改和定稿。

目前,国际上相关的研究还在不断地深入,我们也在继续探索之中,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还很多。遗憾的是,由于理论的复杂性和发表文章的高成本等种种原因,我们在刊物上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和涉及的内容十分有限。

在此,谨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资助过我们研究的基金组织,向所有帮助过我们研究小组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课题进行期间,1998年我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参加了在西班牙召开的与本课题相关的国际地理联合会(IGU)工业地理会议,1999年我获得北京大学基金会香港董氏海外研究基金的资助,参加了在以色列举行的IGU工业地理会议,2000年我获得广东东莞市石龙镇的资助,在东莞主办了与本课题相关的IGU工业地理国际会议,在这些会议上与国际一流学者们就本研究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并获得了大量最新文字信息。

在研究期间,我还有幸先后与研究硅谷的同行专家、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城市与区域规划系A.萨克森妮(Analee Saxenian)教授和研究意大利新产业区的同行专家、都灵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地理教授F.斯福兹(Fabio Sforzi)先生见面并交流学术思想。此外,台湾师范大学地理系徐进钰教授、台湾元智大学资讯社会学研究所罗家德教授、瑞典乌布萨拉大学经济学系梅尔伯格(Anders Malmberg)教授、美国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周宇教授等专家在来京期间,分别与我们研究小组一起进行学术探讨,并把他们关于美国硅谷、台湾的新竹和台北以及瑞典的研究成果慷慨地与我们共享,这一切都为本课题的完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本书还收集了几位海内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是:美国瓦萨学院经济地理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周宇博士、台湾师范大学地理系徐进钰教授、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地理系竹内

淳彦教授等,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为了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 and 思考本书的内容,在一些章节后面设置了专栏,对正文内容进行补充、对比甚至展示不同学术观点,或以实例对正文作辅助说明。专栏内容中有的实例来自报刊,原文由记者所作,本书作了适当删减和精炼。在这里对原作者表示感谢,不当之处请指正。

还要特别感谢对我们调查研究工作给予过支持和帮助的浙江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阎春友主任、广东省东莞市科学委员会叶景图主任、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管委会邵欣平副主任;感谢浙江温州乐清市柳市镇和诸暨市大唐镇、广东东莞市清溪镇、长安镇和石碣镇、河北清河县等地给我们提供研究条件的政府和企业有关人员,以及东莞台商协会、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 IT 专业人士协会等组织的有关人员对我们研究的理解和协助,由于篇幅所限,这里未能一一列举他们的姓名。

在撰写研究报告之前,国内本领域的兴趣爱好者也在百忙之中出席我们研究小组的专题研讨会,并对研究提出了宝贵的建议,他们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庞效民和刘为东副研究员、河南大学苗长虹教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柴彦威副教授、李国平副教授、曹广忠博士等。

由于时间关系,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只是我们研究的部分成果,并且还很不成熟。结题之际,我参加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01年1月23—24日在巴黎举行的“地方企业集群”世界大会,感受到世界各国正在把地方企业集群作为重要的公共政策来实施的蓬勃之势。科学研究是无止境的,更多的新问题有待我们去探索。我们愿意把这些成果拿出来和大家分享,希望这些研究能够在我国开花结果。这也算“抛砖引玉”吧。

王缉慈

2001年1月于燕园

前 言

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各区域的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就业正在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产业的发展道路也正面临着重要抉择,机遇与挑战并存。为什么美国硅谷和意大利东北部产业区等地会取得经济上的成功?面临国际竞争的压力,如何形成和保持区域竞争优势?如何通过增强本地企业集群的创新能力和增强国家竞争优势?如何使那些能够增加国民收入、改善生活质量的经济活动固定在本地而不至于流失?这些都是各国共同面对的问题。

在我国还有更多的问题要思考:美国硅谷能否在我国的一些地区复制?为什么台湾的微机产业会集聚在台北到新竹一带?为什么中关村的企业会北雁南飞,把一部分价值活动放在东南沿海?为什么许多政府在某地想倡导的产业并未形成,或不如预期中的成功?为什么一些花巨资所建成的开发区却没有真正发展起来?为什么很多地方自发地出现了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专业化企业“扎堆”现象?在那些地方,是千篇一律地组建企业集团,还是建构不同形式的网络组织?如何使这些区域获得持续稳定的发展?在一些外向型制造业集聚区域,例如广东东莞,低成本优势正在减弱,如何利用业已形成的集聚优势,实现本地产业结构升级?对于那些“筑巢引凤”式的区域,又如何有意识地发展企业集群?

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是把上述问题作为出发点,探讨企业集群和区域发展的书,又是探究区域创新环境的书。

世纪之交,知识和技术的创造、传播和共享方式剧烈变革,使得

企业内部跨区域的信息交流能力骤增,跨国公司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控制其价值活动,形成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与此同时,技术创新和知识创新又极大地突出了地方企业集群的重要性。世界上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和决策者共同认识到,在全球经济激烈竞争中,需要增强国家竞争优势。国内的全球性企业对于增强国力固然重要,扎根于特定国土上的企业集群更加重要。国际竞争压力将促使政府在产业组织和区域管理中采取有效行动,发展企业集群。

企业集群^①,又称产业区、地方生产系统、地方企业网络,是产业的空间集聚现象,它既有本地社区的历史根源,又经常取决于本地企业之间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集合。这些国土又不是封闭的系统,而是对外开放的。经验研究表明,一些地方的经济获得了成功并保持了竞争力,是因为这些地方具有高效的本地企业网络、快速的信息扩散和专业诀窍传输。通过运营本地的网络,并且整合来自外部的信息,逐渐地增强了那里原有的特殊资源。研究发现,区域内行为主体之间的信息和知识循环在地理区位靠近的条件下得到改善,创新机会也在地理接近的情况下得到增加。但是,仅仅有企业的地理靠近,不必然导致创新的发生以及信息和知识的扩散。创新机会的出现还有另外的条件,这就是社区的创新文化,它往往含有组织变革和制度安排的因素。

企业集群作为一种典型的经济活动空间现象是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学者们很早就发现,人类许多经济活动都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趋向,在广袤疏落的乡村大地上形成人口稠密的工业化区域。交通和通讯技术的限制曾经是经济活动地理分布的主要因素,自然资源或市场位置对生产活动选址的束缚成为产业活动向特定区位集聚的主要原因。随着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一些生产活动可以分解成不同的阶段,跨国公司根据各生产阶段的特点在全球范围寻找不同的生产区位。有关经济全球化的论述为我们描绘

^① 英文文献称之为 local clusters of enterprises 或 industrial clusters,在我国的相关文献中,有“企业集群”、“产业群”、“企业簇”、“产业群簇”等称谓。本书正文中用“企业集群”,而在个别地方(如专栏3)中则用“产业群”的称谓。

了一幅新的产业空间景象:在技术发展一波又一波的冲击下,生产活动随着资本流动的涡轮在世界范围内移动,有的区域出现爆发式的增长,也有曾经繁荣的区域迅速衰落下去。

然而,生产的本地化特征并没有消失,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程度并没有因生产过程的分散而下降,在光滑的产业空间内存在一些粘滞的地点,吸引生产活动在这里聚集(Markusen, 1996)。特别重要的是,区域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和等级体系更加明显,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和联系更加密切。这种新的企业集群现象的动态演化和内在动力机制吸引了经济地理学、产业组织学、社会经济学、技术经济学和创新研究等众多学科的关注,并在公共管理和规划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自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开始的经济地理学是研究经济活动空间分布和企业区位选择的学科。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经济地理学者,尤其是其中的工业地理学者对“新产业区”的研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研究中使用了大量其他学科的有关概念。与此同时,M·波特和P·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也在一系列的论著中表示了对经济地理的极大重视。波特提出了经济地理学应成为经济学中的核心学科的观点,他指出,“传统的区位理论和经济地理学包含了有用的共同理论。韦伯1929年提出了最小费用的区位理论,廖士1954年为最优区位建立了从空间上考虑供求的理想模式,经济地理学研究工厂集中在一个区域的集聚经济,并着重于专业化经济。在与高技术有关的区域发展理论中也包含了有用的观点,尤其是如霍尔(Hall)和马库森(Markusen)研究了硅谷现象。我的理论认为地理集聚是创造优势和保持优势的一般过程的一部分。而经济学并没有把经济地理学看做核心学科,我的研究建议,它(经济地理学)应该成为(经济学的核心学科)。”(Porter, 1990, 第790页)克鲁格曼也提出,经济地理将成为经济学的新前沿(Krugman, 1995; Martin and Sunley, 1996)。此外,经济社会学、管理学等很多其他学科的学者也纷纷从本学科和相关学科的角度对新产业区的有关理论进行了探讨。大量实例研究也层出不穷。

从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历史上看,对企业集群和区域发展的认识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80 年代中期以前

已为人们所熟知的集聚现象的传统解释,是节约运费和能耗,因此企业需要尽可能靠近矿产或能源地,以及靠近市场,靠近优越的交通地理位置,在那些地方“扎堆”。

例如,在古代的山区,由于交通不便,耕地缺少,甚至为了防御敌人的入侵,居民集聚在一起。在那些雨量不足或饮水缺乏的地区,为了共用水源或凿井,人们也要集聚。东亚稻米栽培区和地中海沿岸的葡萄栽培区要用很多人工,所以出现集聚的定居。产业革命以后,集聚的趋势更加明显。产业革命开始于 18 世纪末的西欧,后来传到北美洲,然后传到世界各地。过去认为,历史上产业区的地理分布说明产业革命的发源地及其在世界上的扩散范围和程度(王恩涌, 1991, 第 375 页)。北美产业集聚区域位于美国东北部的西起芝加哥,东经克利夫兰、匹兹堡到波士顿止的地带和加拿大蒙特利尔经多伦多到温泽的工业走廊;老的欧洲产业区有英国的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南部区域、比利时和荷兰的一些区域、德国莱茵河沿岸和鲁尔区、法国的洛林区域、意大利北部的波河区域、原苏联的乌克兰和乌拉尔区域;亚洲的产业集聚区域包括日本东京到八幡的区域、我国的东北的辽东南区域、印度恒河河口区域;澳洲的产业集聚在其东南部区域等。

工业区位论的鼻祖、著名的韦伯在 20 世纪初的研究中已经认识到集聚的重要性(Weber, 1929),并把它作为区位因子之一,但是,以他为代表的规范区位理论却长期以单个工厂作为研究对象,关于集聚的分析并不令人满意。对集聚研究的忽视在西方一直延续到 60 年代,在我国则延续到 80 年代初。西方 60 年代出现的行为理论,在解释工业区位因素如何被决策者所理解时,仍以单个企业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直到企业地理、区域发展等理论相继产生(McNee, 1960),研究对象才从单个工厂发展到多个工厂,从描述和解释工厂区位发展到分析企业之间、企业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的内容从静态的因素发展到动态的过程,研究的范围从一国扩展到多国以

至全球。60年代和70年代西方地理学界对集聚研究开始感兴趣,一方面是由于认识到古典区位理论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是受了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的启发。“投入—产出”等为国家经济部门结构而发明的分析手段也被修改和借用来分析较小的地理单位,解释在各种地理范围内的工业集聚和区域发展的力量。

60年代各国的工业集中在少数发达地区,使地区差异加大,导致政治不安定等问题频繁出现。在这种背景下,各国政府寻求分散化政策,在全球掀起了“规划热”。当时在区域发展规划中,增长极战略应用最广,并得到了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提倡(王缉慈,1994a)。为了理解增长极政策的含义,出现了对工业集聚性质和作用的研究。研究指出,通过大型工业设施的建设及运行,可以获得原料和各类服务,扩大劳动力市场,增加收入,直接或间接增加地方财富,促进基础设施的发展,从而发展区域经济,这是一系列循环积累的过程(Myrdal, 1957)。大多数国家政府都制定了相应政策,利用这样的过程来影响工业区位,在落后地区发展工业,企图减少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60年代末企业地理学出现了重大转折,强调企业对环境的影响,而不是像规范区位理论那样只关心经济环境对工业区位的影响(例如靠近原料地、市场等)和只注意个别工厂区位的研究;同时,企业地理学对产业联系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既开辟了理解工业全球化的道路,也打开了理解区域的创新环境之门。从企业入手来研究区域,使工业地理学更加贴近产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实际。

70年代末以前,我国追求平衡布局和国防原则,对产业集聚的认识十分缺乏。建国初期,工厂布点是“一厂一点”。“二五”期间很多工业区和工业城镇新建,要求相关企业在生产工艺和工程设施方面相互协调,各省市广泛开展了区域规划,但是对集聚并没有十分自觉的认识。60年代,限于研究基于自然资源的钢铁、煤炭、石油、化工、电力、制糖、建材等产业各自的布局因素,较少探讨相关产业之间的联系。文化大革命期间,生产布局和规划的合理性一度被否定,区域研究停滞了六、七年之久,在“山、散、洞”的政策影响下,工业建设蒙受了巨大损失。

我国地理学界从70年代末开始注重产业集聚的研究(当时称之

为工业地域组合),陆大道、魏心镇、周世宽、仇为之等人结合国内实践写出了有关论著,提供了珍贵的研究资料^①(魏心镇,1981;周世宽,1983;陆大道,1986;沈小平,1987)。

经济地理学对产业区位的研究一直倾向于实证研究和规划实践相结合,在产业规划领域 60—70 年代以增长极理论为代表的,强调政府自上而下干预地方经济发展,以外来植入推动型产业的方式,带动地方经济起飞的思想占据了主流。

80 年代中期以后

工业在空间上的累积过程和增长极等理论问题一直受到政策实践的检验。本来,很多国家实施传统的区域发展政策,例如对大型工业项目的巨额投资(包括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在本地资源优势的基础上选择和发展主导产业等,是期望这些项目能产生足够的乘数效应,使它们的经济效益扩散到不发达地区,以缩小地区差异、达到共同富裕。但是,这些区域发展政策在各国实施多年,甚至几十年,落后地区所获得的好处仍然是非常微薄的。另外,在实施传统的区域发展政策时,较少重视从根本调整区域的产业结构。因此,人们开始用新的观点对区域发展问题进行再认识,发现传统的区域发展理论有很大的局限性。

① 1980 年王缉慈研究了位于山东淄博南定的铝工业区域内各工厂之间的工业联系,该区域以山东铝厂为核心,建有淄博铝厂(小型市属的电解铝和铝加工厂)等多个工厂,由于“条条块块”的分割,有些工厂之间没有实际的功能联系(王缉慈,1994a,图 7-2)。

1981 年北京大学仇为之教授等对淄博市工业布局“分散过了头”的现象进行了描述:

(1) 在同一工业区的工业企业各自沿铁路、公路线分散摆开,形成“羊拉屎”的布局。

(2) 工业布点时,片面强调不占好地,只考虑节约用地;

(3) 在进山隐蔽的思想指导下,一个厂钻进一条山沟,特别是地方偏僻距城市远,职工家属无法安排,有的最后被迫迁出山沟。

他们在分析原因时指出,有一段时间非经济因素支配选厂,过分强调靠山、分散、隐蔽。对厂址选择不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有时只是按照长官意志“踩脚定点”。在那个时期,几乎没有企业集群的意识,只是考虑节约用地,他们列举了很多实例,对这种做法提出了批评:“由于多年来将工业布局和使用土地的关系弄颠倒了,一切似乎不应该按经济规律来处理,似乎可以不顾一切经济代价,只要不占良田就行。这是唯意志论在经济领域的表现。”(仇为之等,1981,第 13 页)

对传统区域发展理论的反思之一,是它过分简单地强调区际流动的两个要素——劳动力和资金,以此对区域或城市的空间增长过程进行分析。这虽然有利于推理的简明化,却忽视了影响区域发展的重要因素——技术和知识。区域的经济变化涉及到社会、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各地的特征是多方面变化的综合反映。其中,技术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尤其是高技术已成为影响产业结构变化和 world 竞争格局的重要因素,高技术领域的竞争是当前国际竞争的焦点。因此,对区域发展问题的分析,需要强调技术创新和知识创新。

对传统区域发展理论的反思之二,是对在“自上而下”建立增长中心的政策中,单纯依赖外力(外来资本以及本地自然资源禀赋等)的做法表示怀疑,它可能造成脆弱的国民经济。在全球化与本地化趋势并存的世界经济中,更新和创造区域创新环境是很多国家政府为增强国家竞争优势而选择的一种弹性政策措施。很多国家都在探寻和实践依靠内力发展地方经济的道路(endogenous regional development),寻求以知识和技术为本的区域发展战略(Bergman, 1991)。

因此,在新技术革命向纵深发展的形势下,区域研究学者转向探索以技术和知识为本发展区域经济的新理论。在对增长极等区域政策工具进行反思的基础上,研究区域的技术能力,包括创新能力和吸收技术的能力,并研究地区的创新政策和创新环境等问题。在研究方法上,是从企业调查入手研究区域(图 1),不只是对区域进行静态分析和描述,而且持演进的动态的观点预测区域的发展前景。由于全球化的蔓延迅速,而地方企业集群的建构,尤其是企业之间信任关系的培育则需要较长的时间,在研究企业集群和区域发展之间的联系时,也强调时间的重要性。

这个时期超越了过去那种在自然资源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条件下才能获得区域发展的认识。一种激进的观点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共识——工业区域是工业本身的产物,工业化过程孕育着工业区域(Storper and Walker, 1989)。也就是说,工业化的地理形态是由工业发展的内动力产生的,并不是如古典区位理论所论述的那样,由原料地和消费地等外力所引发的。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面对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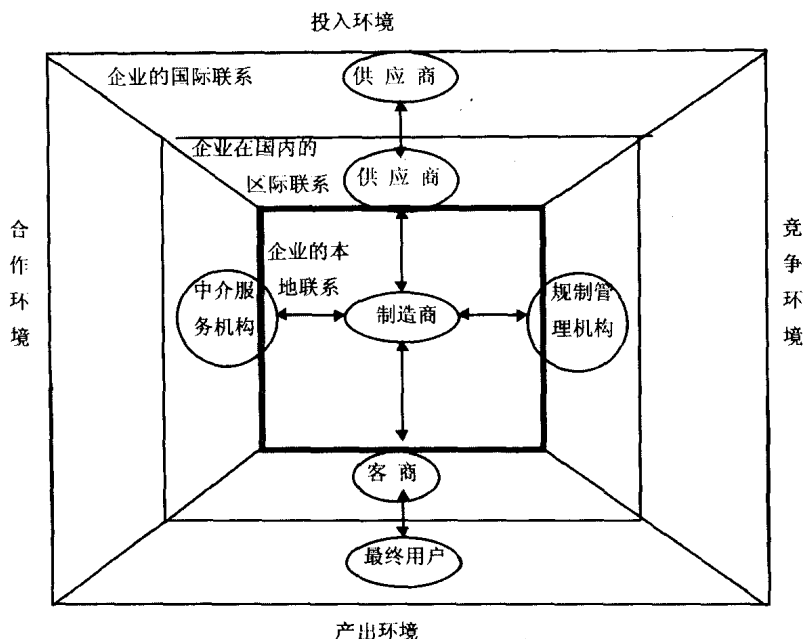


图1 从企业研究区域的一个分析构架

参考资料:根据 Markusen(1994)的图改制。

区域呈现出经济衰退的景象:企业纷纷破产,大量工人失业,人们生活质量相对降低。而与此相反,欧洲和北美少数几个地区经济发展依然保持平稳,甚至继续增长,成为成功地战胜衰退的“经济之星”。这些地区有多种多样的产业,不仅包括技术先进部门,还包括传统的劳动密集型部门。典型的发展迅速的区域主要有意大利中部和东北部的艾米利亚—罗马格纳(Ermillia-Romagna)和图斯卡尼(Tuscany)等地区、德国的巴登—符腾堡(Baden-Württemberg)、法国的欧叶纳克斯(Oyonnax)、丹麦的竹特兰(Jutland)、瑞典的斯迈兰(Smaland)、西班牙的巴塞罗那(Barcelona)、美国加利福尼亚的硅谷等,其共同特征都是存在专业化的中小企业集群(Stoper and Scott, 1989)。

这些地区大量的中小企业彼此间发展了高效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形成高度灵活专业化的生产协作网络,具有极强的内生发展动力,依靠不竭的创新能力保持了地方产业的竞争优势。这些产业区

很像早在 1898 年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就已经描述了的产业集群现象,在这里“……行业的秘密不再成为秘密;而似乎是公开了,孩子们不知不觉地也学到许多秘密。优良的工作受到正确的赏识,机械上以及制造方面和企业的一般组织上的发明和改良之成绩,得到迅速的研究;如果一个人有了一种新思想,就为别人所采纳,并与别人的意见结合起来,因此它就成为更新的思想之源泉……”(Marshall, 1920, 第 225 页)。今天的学者们惊讶地发现,原来早在百年前的马歇尔式的集聚中就已蕴藏着一种“空气”,这就是面对面的交流、信任、协同的氛围,因此,新产业区理论在古老的基础上诞生了,它跟踪了硅谷等地的经济发展现象,并将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在多年的实践中不断发展补充和完善,日益丰富和成熟。

严格意义上的新产业区是新技术革命以后出现的。在新技术革命时期,小企业为主的弹性生产网络模式的出现,使区域发展降低了对跨国公司分厂的依赖性。近些年,新产业区理论常被用来研究创新,要求为企业创新提供一种区域环境,它说明尽管硬环境(完善的基础设施、相邻的大学、便利的交通等等)可以成为创新的条件,但它不必然能够诱使创新的发生,而软环境,即企业与企业之间、人与人之间正式的与非正式的交流沟通,则为创新提供机会。新产业区理论认为,成功的区域是有创新性的区域,区内企业能够持续地创新。那么,是什么使得一个区域成为有创新性的区域呢?区域产业的配置、技术基础结构、文化和制度都对区域的创新性产生重要影响,而分析的出发点是产业集聚。

在灵活性很强的新技术时代,世界经济可以看做是由专业化生产区域拼合而成的。在专业化生产区域,尤其是高技术产业区域,相关工业活动集聚在一起,从而减少交易费用,增强集聚经济(王缉慈, 1994a)。

新的产业集群研究注重集体共享资源,发展人才市场,提高交易效率,企业之间在贸易和非贸易方面相互依赖,并交流隐含经验类知识,使区域成为有利于学习和知识溢出的环境。这样的区域是创造性的、有创新能力的。可以说它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同业和相关产业的很多公司在地理上集聚,二是有支撑的制度结构,三是企业在地